第 62 卷 第 2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62, No.2
2025 年 3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Mar. 2025

从体用不二到体用贯通的文化探索

李小标[1]　方红姣[2]

(1.《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杂志社，北京 100062; 2. 湘潭大学 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湘潭 411105)

摘　要: 中国传统哲学中包含丰富的体用思想，多以形体与功用、本体与现象、原则与方法等层面呈现体用的多向度内涵，开显“明体达用、体用不二”的中华文脉。近代“中体西用”文化体用观从主辅、本末、内外等方面探索与演绎体用范畴的内涵及运用于处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理论与实践融合、继承与创新并重，以“贯通”义承接古今，融通中西，理论上实现了对中国数千年体用传统的传承，在实践中完成了文化体用观探索的超越。

关键词: 传承; 超越; 体用不二; 体用贯通

中图分类号: G 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25) 02-0025-12

2023 年 10 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理论品质的鲜明概括。体用范畴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特有的概念，有其发展演变过程和丰富内涵。近代以来，伴随着“古今中西之争”，传统体用论转而以文化体用观的形式展开。从中国传统哲学的“明体达用、体用不二”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创造与超越，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一、中国传统哲学中体用范畴的文脉开显

“体”与“用”是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中特有的一对重要概念。一般说来，“中国古典哲学中所谓‘体’就是根本的，第一性的; 所谓‘用’就是从生的，第二性的。这是‘体’与‘用’的最简单最主要的意义”①。而且，“它们不是一对实体性范畴，而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关系性范畴”②。这一范畴在中国哲学史上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并在不同思想学派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纵观其演变史，体用内涵大致可以从主体(形体) 与功能(作用) 的关系、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原则与方法的关系等维度进行理解。

(一) 从“体”“用”意识萌动及其隐喻到“体用”对举

“体用”观念的萌芽最早见于先秦文献中，具体的文字表述不限于“体”和“用”两字，多以“本”与“物”、“本”与“用”表示。《论语》中有对“礼之本”与“礼之用”的讨论，“林放问礼之本，子曰: ‘大哉问! 礼，与其奢也，宁俭; 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 又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 这里的“本”指本体、本根和本质，“用”则是指作用和潜能。

《易传》中出现“体”与“用”二字，但没有并列在一起使用。《周易·系辞下》载“阴阳合德而刚柔

收稿日期: 2024-10-18

作者简介: 李小标，《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① 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哲学研究》1957 年第 2 期，第 69 页。

② 汤一介:《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24 页。

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孔颖达疏:"天地之内,万物之象,非刚则柔,或以刚柔体象天地之数也。"①阴阳两种相对而又互补的力量通过结合展现出不同的性质,形成了一切事物的基础。这里的"体"则指的是具体的表现形式或结构。《系辞上》中说到"体"和"用":"一阴一阳之谓道……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②"故神无方,而易无体"③。此处以"仁"和"用"对称使用,"仁"在这里应该作"核心"之义讲,即如同果核或果壳里像仁儿的东西,所以说此处的"仁"隐喻"内核""实体""本体"之义,"显诸仁,藏诸用"实则可以理解为"显诸体,藏诸用"④。虽然《易传》没有直接使用"体用"一词,但其论述已经初步涉及事物内在潜能与外在表现的内涵及关系。

中国哲学史上,最早将"体""用"并举的是荀子。他在《荀子·富国》开篇讲:"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⑤在荀子看来,"同宇"是指同一天地之间,自然万事万物形体各异,并非按照或符合人的需要而存在,却对人有用,这就是自然规律(天数)。这里的"体"指形体,用指作用、功用。值得指出的是,荀子在同一叙述逻辑结构中列举了"体""用"两字,但没有进一步阐释"体""用"的逻辑性关系。所以说,荀子的体用对举尚未被明确用来表达宇宙本体与现象这样的哲学含义。

(二)从"体用"概念生成到"体用"不即不离范畴化

魏晋时期,体用范畴始有明晰的本体(本质)与现象(本质所表现的作用)的哲学内涵。"直到魏晋时期,'体'和'用'才成为一对重要哲学范畴,有了明确的哲学涵义。"⑥"体用的概念绝对是王弼首创的,后来演变为中国佛教与新儒学的主要概念。"⑦

王弼在《老子注》中,多次使用体与用、本与末。"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⑧对于这里体和用的理解,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体为宇宙本体,即无。用指万物的功用、作用(陈鼓应、许抗生等持此观点)。一种认为,这里的"体"指形体,"用"指本、根本、本源(王葆玹、王晓毅等持此观点)。王葆玹进而认为,王弼以"体"为形体,"用"为根本,与我们后来对体用概念的内涵理解是颠倒的。他说:"'不能舍无以为体'如同说'不能舍去无而存在或保存完整','体'即本身、全身之义……这实际上'不是以无为体,以有为用',而是'以无为用,以有为体',与后世体用之说正好相反。"⑨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合理之处。二者的差异主要在于对"体"的不同诠释,"用"的含义也相应有异。关键在于"以无为用"的"以"字作何解。结合文本上下文,王弼释天地万物都是以"无"为本原,此"无"在一定程度上同于"道""自然"之义。"万物虽贵,以无为用",对比《道德经》第十一章"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以无为用"表示万物借由"无"(道、自然)而有其功用。所以,万物以无为用,不能舍去无而言体,此处的"体"有万物的形体、存在之义。王弼在这里建立起"无"与"万物"的关系,并通过万物之形(体)不能离开"无",万物之功用(用)不能离开"无"进一步阐发万物与"无"的关系。因此,此"体"指万物之形体,此"用"指万物之功用、作用。体与用统合于万物,即体即用。不过,王弼尚未赋予体用以本体和现象的对举内涵,真正具有本体内涵的是"无""道"概念。

王弼《老子注》中又说:"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

---

①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11 页。
②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周易正义》,第 268—270 页。
③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周易正义》,第 268 页。
④ 参见胡勇:《中国哲学体用思想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85 页。
⑤ 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整理:《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173 页。
⑥ 方克立:《论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方克立论著集》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166 页。
⑦ 陈荣捷:《中国哲学文献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95 页。
⑧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94 页。
⑨ 王葆玹:《玄学通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1996 年版,第 465 页。

故母不可远,本不可失。”①其“崇本举末”或“举本统末”的观点,试图超越经验层面,寻求一种更深层次的统一性。体用、本末之辨成为魏晋玄学的主要理论,也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理论思维方式。

东晋佛学家僧肇精通老庄思想,对于“体用”含义及关系亦有阐发。僧肇在《般若无知论第四》中曰:“用即寂,寂即用。用寂一体,同出而异名,更无无用之寂而主于用也。”②用与寂不分离,用寂一如,同出于“体”,这里与“用”并称的是“寂”概念,而非“体”。但此处“寂”是本体之意,一切万有的背后都有一个不变的实体,这个实体通过其潜能、呈现、作用或属性展现出来,是为“用”。

僧肇还以“动静”来解释“体用”。《物不迁论》中言:“寻夫不动之作,岂释动以求静,必求静于诸动。必求静于诸动,故虽动而常静;不释动以求静,故虽静而不离动。然则动静未始异,而惑者不同。”③僧肇认为俗见之“物”,往来迁动,只是虚妄不实的现象,并无真实的迁动。从现象界来看,万物似有动有静,但从本体界来看,则动即是静,静即是动,动静不二,体用一如。汤用彤对此评价道:“肇公之学说,一言以蔽之曰:即体即用”④,“已谈至‘有无’‘体用’问题之最高峰,后出诸公,已难乎为继也”⑤。

南北朝时期,体用对举,且作为本体与本体的作用,两者不即不离的表述更为明晰。“臣绩曰:既有其体,便有其用。语用非体,论体非用。用有兴废,体无生灭者也。……夫体之与用,不离不即。离体无用,故云不离;用义非体,故云不即。”⑥

(三)儒释道融合彰显“体用不二”的理路空间

从魏晋到隋唐,“体用”思想经历了从玄学到佛教再到儒释道并立的演变过程,特别是在佛教中得到了深入的探讨。“体”被视为超越一切相对性的绝对真理——空性,而“用”则是基于空性基础上产生的种种现象。这样一种注重空性与缘起关系的诠释方式促进了天台宗、华严宗的理论发展。天台宗强调“一念三千”,一念之中包含三千诸法,体用相即,无有分离。华严宗主张理事相即、事事相即,即本体(理)与现象(事)是相即不离的。

禅宗六祖慧能认为心即是佛性,佛性即是本体。修行是本体的功用或表现,即体即用。六祖之后,慧海对体用义进行了诸多阐发与深化,《大珠禅师语录》卷下记载:“净者本体也,名者迹用也,从本体起迹用,从迹用归本体,体用不二,本迹非殊。”⑦这或是“体用不二”一语的最早出处。

儒家对体用思想的阐发主要体现在《周易》诠释中。崔憬发挥体用的原初义,“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也”。⑧以“体”为万物之形体(形质),形而下之器。用指形体(形质)所具有的妙用,形而上之道。另一方面,儒家开始运用体用思想批评佛教的重体轻用,强调体用两者不可分离。柳宗元称“又有能言体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须离也”⑨。认为体不能离开用,有其用必有其体,有其体必有其用,借此批评佛教妄取空语,不求实践。

成玄英对“本迹”与“体用”范畴非常关注,提出本迹相即、从本降迹、摄迹归本。《道教义枢》在成玄英“本迹”阐述基础上,视“本”与“体”同,“迹”与“用”同,并以体与用论述道与德,将道与德看作体与

---

①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第 95 页。
② 僧肇:《肇论校释》,张春波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106 页。
③ 僧肇:《肇论校释》,张春波校释,第 11—12 页。
④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36 页。
⑤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 240 页。
⑥ 萧衍:《立神明成佛义记并沈绩序注》,石峻、楼宇烈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 1 卷,北京: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99 页。
⑦ 慧海:《大珠禅师语录》卷下,石峻、楼宇烈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 2 卷第 4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3 版,第 197 页。
⑧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卷 8,北京: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611 页。
⑨ 柳宗元:《柳宗元集》第 2 册,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680 页。

用关系,认为道是体,德是用。

(四)理学升华证成“体用不二”的内在逻辑

宋明理学“体用不二”的说法来源于佛教禅宗慧海。至北宋,理学通过体用的诠释,以体用不离、体用一源批判佛教的虚无,强调致“用”,最终演化成“体用合一”“体用一致”等不同表达形式。

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力倡“明体达用”的儒学。他将圣人之道解读为三个维度:体、用、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是体,是经世不变的。润泽斯民,用之于天下,这是经世之用。由体至用,体用相通。文则指经史子集等经典文献。这是胡瑗弟子刘彝在回答宋神宗“胡瑗与王安石孰优?”的问题时,对胡瑗人才培养原则的概括。在刘彝看来,他的老师胡瑗以明体达用之学教授学生,纠正朝野崇尚声律浮华之词的弊病,成效明显,培养了大量既通儒道又能经世的人才。

程颐提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将体与用诠释为理与象、理与事之间的关系,理是体,是事物的本质,是至微的;象、事为用,可看做感性的迹象,是显著的。“至显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显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学者,以其能通于此而已。”①体微而用显,二者无有分隔而同出一源。

朱熹继承“体用一源”思想,并将体用范畴运用到多个领域。钱穆对朱熹体用思想做了分类,如“耳便是体,听便是用;目是体,见是用”,体是形体,用指形体的功用;“心有体用。未发之前是心之体,已发之际乃心之用”,未发与已发是心的体用关系;“礼仪三百,威仪三千,须是仁做始得。凡言体,便是做他那骨子”,礼与仁是体用关系;“性是体,情是用”,性与情是体与用的关系;“看文字须活着意思,不可局定。知对仁言则仁是体,知是用。只就知言,则知又自有体用”,“体是这个道理,用是他用处”②等。体与用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是相对的关系。朱子的体用范畴更多的是方法论与本体观上的意义。

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王夫之在继承改造程颐“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推故而别致其新”,“体用胥有而相需以实”的“体用不二”思想。王夫之一方面从物之体与事物的功能讲体用。他说:“夫手足,体也;持行,用也。浅而言之,可云但言手足而未有持行之用,其可云方在持行,手足遂名为用而不名为体乎?”③这与朱子所讲“如这身是体;目视,耳听,手足运动处,便是用。如这手是体;指之运动提掇处便是用”④如出一辙。在此,“体”指形体、形质、实质、本体等有形质的可以感觉得到的具体事物,“用”指该事物的实际作用、功用、效果、用处、现象等。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体用胥有而相需以实”⑤的体用关系说。他在《周易外传》中提到:“夫体用不二,即体而言用在其中,即用而言体在其中。”这就是说,借由天下万物之用,可以知晓其体为“实有”,这种实有可以通过感觉去把握。此外,王夫之还批评佛老的“消用以从体”。他说:“善言道者,由用以得体。不善言道者,妄立一体而消用以从之。”⑥体与用相互依存,不可于用外求体。

总之,在古代中国哲学看来,“体用不二”思想的核心要义主要表现在:首先,从哲学基础看,“体”和“用”是统一的。“用”不可能离开“体”而有“用”,“体”也不能无“用”以为“体”。其次,从实践意义看,“体用不二”的理念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认为只有理解了事物的本质(体),才能正确地运用其功能(用)。最后,从伦理影响看,“体用不二”提倡内在道德与外在行为的统一,认为人的道德修养(体)与其行为表现(用)应当是一致的。“体用不二”思想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一是忽视变化发展。“体用不二”强调事物的内在本质与外在表现的统一,但在面对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时,这一思想可能无法充分解

① 程颢:《二程遗书》卷二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80 页。
② 钱穆:《朱子新学案》第 1 册,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69—475 页。
③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北京: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62 页。
④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101 页。
⑤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 1 册,长沙:岳麓书社 1988 年版,第 861 页。
⑥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 1 册,第 862 页。

释事物由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变的过程。二是理论与实践脱节。在实际应用中,往往存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可能导致理论上的“体用不二”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实现。三是道德与实践的矛盾。该思想强调内在道德与外在行为的统一,但在现实社会中,人的内在道德与外在行为可能并不总是一致,这种矛盾可能导致理论与实践的冲突。

二、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体用思想的文化争鸣

进入近代,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社会的剧变,“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中国思想界和政治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在应对近代生存和发展困境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否还有价值和意义,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为何? 19 世纪 80 年代,围绕“古今中西之争”、以体用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文化的体用观成为近代体用问题的新发展。

(一)“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

早期维新派有“中体西用”“西体中用”说。“中体西用”最早由冯桂芬提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①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加以阐述,“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②从主和辅解释体用,这里的“体”既有主要方面之义、又有主导之义。王韬用“道与器”来表述“中体西用”思想,“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事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儒道也,亦人道也”。③

张之洞在《劝学篇》作出全面阐释,“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 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④。在张之洞看来,中学西学二者在功能上互补。“内篇”讲“以中学为体”,包括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九篇。“外篇”讲“以西学为用”,包括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十五篇,强调“中学”是核心和基础,要以中国传统的政教为主体和根本,而辅之以技术层面的“西政”和“西艺”。

“西体中用”是早期维新派提出的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另一个命题,其核心观点认为,西方国家自有体用,即政治上以议院为本,经济上以商为本,文化上以学为本。其立国之本在于议院,中国欲富强,必须仿行议院,改革政治,学习西方的政制、天算、地舆、数学、化学、重学、光学、汽学、机器、兵法诸学。后来的康有为亦主张学习西方制度,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中国迈向现代世界最温和、最安全的方式。

有批评者认为,以体用范畴来讲完全不同的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与传统就同一事物而言讲体用截然不同。严复说“善夫金匮裘可桴孝廉之言曰: 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 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⑤在严复看来,中学、西学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事物,各有体用,不可强行融合。

严复所说不无道理。传统的体用,大都是基于一个事物,说它有体有用,就此层面而言,不论是何种意义上的体与用,是本体(实体)及其作用、功能、属性,亦或指本体(本质)和现象的关系,体用都是不可分离的,体用不二。不过,朱熹曾说体用无定,体用关系不是绝对固定的,如“知对仁言则仁是体,知是用。只就知言,则知又自有体用”,知有体用,而知相对仁而言,知仁又构成体用关系。按此逻辑,是否

---

①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戴扬本评注,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11 页。

② 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4 页。

③ 王韬:《杞忧生〈易言〉跋》,《弢园文录外编》卷十一,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66 页。

④ 张之洞:《劝学篇》,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1 页。

⑤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 3 册,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版,第 558—559 页。

也可以说,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而中学相对西学而言,二者又可构成更大文化体系中的一种体用关系?

中体西用说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范畴,从主和辅、本与术、道与器、内与外来界说体用含义,以此来处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为体,是主、本、道、内,西方文化为用,是辅、术、器、外,试图通过吸收西方现代科学、政治、经济等器物和制度层面的思想文化为我所用,以补传统文化之不足,从而强固"中学"的"体"。就建构不同于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而言,中体西用强调中学为主导,西学为辅助,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坚守,而西体中用说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西方制度认识的更进一步。但正如前面所述,"体"和"用"并非两种具体的事物,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统一关系。据此,汤一介认为,"我们就不能用这对范畴来表达'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因为无论'中体西用''西体中用'或'中西互为体用'都是对'体'和'用'这对范畴的误用"①。

(二)"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人的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人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人通过劳动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

马克思主义重视文化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机制,强调文化与社会结构、经济基础之间的密切关系,文化具有民族性和相对独立性。不同民族按照不同的经济方式,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不同的心理素质、精神气质和文化特色,发展出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形态,从而形成各自的民族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这些构成了民族文化的独特标识。文化在反映现实社会存在的同时,还具有遵循其自身的发展规律的特点,具有历史传承性。

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立足于文化的特质和文化的传承性,就古今中西问题,从文化的源与流提出并阐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1964年正式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

学习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继承。"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②。此为"古为今用"。文化发展还应海纳百川,"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③ 此为"洋为中用"。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一方面不再限于中西方的视域,同时也跳过体用并举的言说框架,落脚于"用",强调以今时中国之主体,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辩证的总结和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凸显了文化主体性和文化自觉。

(三)"综合创新"与"兼和创新"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对文化的体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们致力于打破近代以来中西二元的思维框架,从处理中西的关系到关注马、中、西的关系,凸显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

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张岱年提出"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模式",明确阐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其要义可概括为:"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模式,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与欧洲中心论的干扰,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对古今中外文化系统的组成要素和结构形式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审慎的筛选,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发扬民族的主体意识,经过辩证地综合,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这种综合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折衷,而是辩证的。这种综合需要创造精神,是一种创造性的综合,而这种综合又为新的创造奠定基础。

---

① 汤一介:《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我们坚信,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是一个新的创造,同时又是多项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的新的综合。”①张岱年提倡的这种综合的文化观,一方面引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和社会主义原则,并着眼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同时强调对古今中外的各文化系统进行分析和吸收。这种综合不是调和折中,而是辩证的综合,目标是创造一种兼具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文化。

方克立对张岱年的“综合创新”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阐释。从最初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16 字诀到 2006 年的“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新概括,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和发展的过程。方克立认为,中国必须要有一个既符合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实际又能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外来文化和本土历史文化遗产一贯精神的文化方略。他说 “中国马克思主义派怎样实现文化上的综合创新呢? 在我看来,其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要按照‘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兼和’的思路,把作为文化资源的中、西、马三‘学’科学合理地整合起来,实质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和西方文化(外来文化) 的‘他山之石’地位三者有机结合起来,辩证统一起来,‘坐集千古之智’,创造具有博大气象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显然,这种‘马魂中体西用’三学合一、综合创新的观点,既符合张岱年‘文化综合创新论’之精神实质,也符合李大钊‘第三新文明’论和毛泽东‘古今中外法’之精神实质的。”②

“马魂中体西用”三学合一、综合创新的文化主张最重要的特征在于: 一是坚持以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二是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与本民族文化的优质基因血脉相连; 三是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作为营养。特别指出,“中学为体”之“体”即指“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总之,“综合创新派”凸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同时强调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开放性,主张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为文化建设的方向和路径提供了有益思考。

三、习近平体用贯通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观的集中表达,在传统“明体达用”的基础上,补“体用贯通”四个字,既体现了对传统体用思想的继承,更彰显出对传统以及近代以来体用说的超越; 既“充分展现其传承性、开放性、融通性、自主性、现代性、创化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和方法论意蕴”,更彰显“新时代破解文化‘古今中西之争’、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必由之路”③,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如何彰显主体性”指明了前进方向。

(一) 术语“两创”: 体用贯通概念的吐故纳新

中国传统主要从形体和功能、本质和现象等方面界定体用内涵,在体用关系上倡“体用不二”,即体即用,体用不离。同样主张体用不二,各家又有所侧重,儒家注重致用,由体至用,故有明体达用之说,可以说是宇宙论与人生论的统一。佛道两家尤为重“体”,体是超越万有的“空性”,有“从迹用归本体”之说,故注重人的修为工夫,通过修为而归体,比较而言更侧重人生论。

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于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伟大实践中,扎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沃土,体现了中西方文化平等交流与互鉴的姿态。其“体用贯通”是对传统“体用不二”的创新性发展,它不再囿于宇宙论或人生论,更是方法论,涵摄更广阔深远的历史社会发展总体,是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其次,“体用贯通”是从“带有根本性质的关系性的范畴”角度来理解和运用的,强调文

---

① 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90—391 页。

② 张小平、杨俊峰:《“马魂中体西用”与文化体用问题纵横谈——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方克立教授》,《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 年第 5 期,第 21 页。

③ 施郑理:《浅谈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逻辑》,《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24 年第 2 期,第 8 页。

化的辩证“发展变化性”和联系性,超越了中国传统哲学忽视变化发展的形而上的理解。再次,“体用贯通”强调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和认识论,来理解文化的实践性和理论性的相互转化。文化是对现实政治、经济的主观反映,是第二性的存在,但文化也反作用或服务于客观政治、经济生活。贯通思想文化与现实生活无疑是科学的文化态度。所以,习近平强调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①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既有思想理论层面的认识论,也有实践操作层面的方法论;既有宏观层面的规律性认识,也有具体层面的实践路径,实现了主体与作用、理论与实践、世界观与方法论、传承与创新等多个方面的辩证统一。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之“体”,是文化的主体。中华民族是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建设主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主体、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主体。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政治立场。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讲人民性,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只有坚持人民立场,才能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也才能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活力、创造力,使文化发展获得不竭动力源泉。文化自信的提出,是对文化主体性的极大彰显。习近平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②坚定文化自信,就是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文化生命力、文化创造力的高度信心,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坚持走自己的路,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之“体”,是文化的魂与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③“魂脉”与“根脉”的统一构成推动古老文明的根本保障。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提出“两个结合”,深刻阐明体现新的生机活力“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④。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民族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指明道路,为中华民族在民族复兴中找回文化自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魂脉,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习近平文化思想创造性提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革故鼎新、辉光日新,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中华文明具有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多元一体、团结集中。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特性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很多重要元素所塑造的,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进程中,总结、概括、提炼这些突出特性,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重要,明确这些突出特性,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之“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把培育和弘扬社会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13 页。
②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536 页。
③ 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求是》2023 年第 20 期,第 5 页。
④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 年第 17 期,第 6 页。

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周易》有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②文化之大用乃“化成天下”。文化工作的目标是要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要着力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人心、深入人心。只有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文化建设才能形成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

(二) 内涵出新: 体用贯通表征的焕然一新

“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通者,由体通用,体用贯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贯通”特别强调文化之“体”的功能和作用,现象和表象、器物和制度之“用”,强调文化在延续、维持和促进民族发展、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世界文明互鉴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体用贯通,包涵以下几个方面:

魂脉与根脉相结合。要将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二者有机结合,以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与发展。“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③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④因此,“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⑤。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我们处理好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一系列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要精神财富极大丰富”。⑥ 新时代文化建设要坚持两手抓、两手硬,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①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54 页。
② 杨天才,张善文译注:《周易》,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207 页。
③ 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求是》2023 年第 20 期,第 5 页。
④ 习近平:《必须坚持自信自立》,《求是》2024 年第 14 期,第 11 页。
⑤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64 页。
⑥ 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求是》2023 年第 16 期,第 6 页。

文明多样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统一。“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①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活力所在;“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导向;“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要求;“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我们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理论与实践相贯通。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理论。在文化建设过程中,这种“体用”的关系不仅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还反映了文化发展的动态过程:一方面,文化理论需要不断从实践中汲取营养,丰富和发展,离开了人民的实践和生活,“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②。另一方面,文化实践也需要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以确保其方向正确、内容健康。

(三)使命赋新:体用贯通催生文化新生命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要求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做到以体摄用、以用明体。任何具体工作都是载“体”之“用”,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引导人们见体、明体,从而达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在明确文化本体的基础上,达到实践的应用,并在实践中不断验证和发展理论,形成体用的良性互动。这一思想不仅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继承与发展,也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时代意义和新的使命。

2023 年 6 月 2 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标识性范畴——“新的文化生命体”所谓“新的文化生命体”有四层意涵:一是“两个结合”的产物;二是古今中外文化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下“化学反应”的有机统一的整体;三是面向和引领未来发展的中国气派、中国作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四是在体用贯通中展现生机活力的新型文化。

体用贯通实现文化传承。“以文化事”,就是发挥文化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作用。体悟习近平文化思想,我们深刻感到,文化的理念、文化的力量已深深融入到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之中,生动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各方面。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们能更好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动,在更广阔文化空间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使中华民族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

体用贯通加速文化融合。“以文化人”,就是发挥文化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大作用。这是文化最基本最直接的功用。随着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节奏加快,人的精神生活方面问题越来越引发关注,越来越需要精神文化来安顿身心、滋养心灵。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强调发挥文化和道德的教化滋养作用,让中华民族精神世界更加厚重深邃,让人民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充实。

体用贯通推进文化创新。“以文化时”,就是发挥文化对时代进步和人类发展的重大作用。“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③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从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走向未来的智慧,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方案。

结　语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中“体”与“用”思想的继承,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从传统哲学的明体达用、体用不二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明体达用、体用贯

①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第 401 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16 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65 页。

通，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观对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哲学、近代以来的文化体用观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传承与超越。在新的文化使命的视域下，体用贯通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首先，创造性地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古今中西之争”是近代中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何看待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如何传承并创新传统文化，如何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清末民初，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们对西方富强之因、中国落后之因以及中国现代化之路径的判定有过明显的转变。从器物之变到制度之变再到文化之变的三部曲，“古今中西之争”的形态日益清晰。针对这一问题形成了不同解决方案。“中体西用”论主张在保留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和优秀文化的前提下，积极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随着辛亥革命的到来，中体西用论在科技及政治层面宣告破产与之类似的还有西体中用论 、中西互为体用论等。

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中国化，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贯通则创造性地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①。中国式现代化是正确处理“古今中西之争”的现实典范，它赓续古老文明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世界现代化所具有的共同特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借鉴吸收一切人类文明包括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又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是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的现代化。习近平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论断和要求，创造性地把“一个结合”丰富和发展为“两个结合”，“第二个结合”对“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具有特别重要的原创性意义。

“古今中西之争”的解决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它不仅关系到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选择。通过解决这一问题，可以更好地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其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贯通”深化了对文化生成规律的认识。它强调文化是在“对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交互推移中生成和发展的，这一观点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关于文化生成的唯物史观基本立场，还进一步彰显了文化生成的主体性、民族性，体现了文化生成的历史性，并突出了文化生成的时代性。这种以实践为根基、以人为主体、以文化传统为思想基础来把握文化生成的新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深入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贯通”提升了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它不仅强调了文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还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目标和任务，这显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这种对文化地位的深刻理解和对文化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把文化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推动人类文化观念实现了历史性转变。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新时代文化建设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如，创造性地把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鲜明提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深刻理解“两个结合”、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等重大创新观点，等等。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重大课题，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最后，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指明了具体方向和实践路径。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文化工作的七个着力点要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等，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围绕七个着力点，要按照“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要求，充分重视

---

①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 年第 17 期，第 11 页。

各层面的“用”,我们的文化发展蓝图只有落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在寻常百姓的生活空间得到显现,各项工作才是真正的落地见效。

关于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方面,就“用”的层面而言,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依法加强网络社会管理,为广大网民营造风清气正的晴朗网络空间。

关于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要重视新时代“家文化”建设,完善相关的保障制度,让家成为每一个人温暖的心灵港湾,成为社会和谐的基础力量。以家为细胞,激活小家、社会、国家之间的同构共生活力,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心、见行,成为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

关于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方面,要加强传统文化遗迹的保护和重建,加强红色文化基地的建设和利用,发挥文化载体的教育功能。加强文化与科技的融合,通过科技的赋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获得更加贴近人民群众日用生活的好形式。

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是强大思想武器,又是科学行动指南。“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从根本上解决了在新的文化生命体建设中如何将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贯通的问题,将文化强国建设置于中国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根基中,创造性地破解了困扰近代中国百余年之久的文化发展难题,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创新和发展。

The Cultural Exploration from Non-Duality Between Substance and Function to Substance-Function Holistic Integration

Li Xiaobiao　Fang Hongjiao

(1. *Study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Beijing* 100871, *China* 2.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Historical Culture*,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contains a profound tradition of substance (体)-function (用) conceptualization, which manifests its multidimensional connotations through such dialectical pairings as form and function, noumenon and phenomenon, as well as principle and methodology. This intellectual framework elucidates the Chinese cultural ethos epitomized in the doctrines of "illuminating substance to actualize function" (明体达用) and "non-duality between substance and function" (体用不二). The modern cultural paradigm of "Chinese substance as noumenon and Western learning as supplement" (中体西用)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and elaborates the categorical framework of substance and function through dialectical modalities of primacy-supplementarity, ontological hierarchy, and internality-externality, while applying this conceptual apparatus to mediate the cultural interplay between Chinese tradition and Occidental modernity.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in the New Era proposes "illuminating substance to actualize function, and achieving substance-function holistic integration (体用贯通)" — a dialectical synthesis of theory-practice integration and equilibrium between heritage and innovation. This framework philosophically not only actualizes the theoretical inheritance of China's millennia-spanning substance-function tradition through the hermeneutic continuity of "holistic integration", bridging classical-modern temporalities and transcending the East-West civilizational dichotomy, but also accomplishes an epistemic transcendence in cultural exploration through the century-long praxiological formatio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inheritage; transcendence; non-duality between substance and function (体用不二); substance-function holistic integration (体用贯通)

(责任编辑　刘曙光)